

历史的书写 及面向未来的书写

□杨勇

致敬烽火岁月的英雄

读《北方文学》抗战题材作品札记

□文 王宏波

年初大雪纷飞的时候，我在书房整理过去一年的书刊，翻看着厚厚的一摞《北方文学》，被其中东北抗日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深深地打动。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缅怀为国牺牲的英雄，《北方文学》制定了立足东北尤其是黑龙江本土的出版计划，挖掘白山黑水间的浴血抗战往事，唤醒沉睡的历史中迎着枪林弹雨冲锋的英雄们，弘扬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是东北民众与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历经14年艰苦抗战铸就的坚定信念与英雄气概，是超越时空、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北方文学》以多元文学形式、鲜明的文化叙事特色，深化了东北抗联题材作品的历史深度，增强了历史厚重感，全方位、多维度创作出兼具情感温度与时代高度的作品，为东北14年浴血抗战与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筑立起一座座鲜活英雄群像。

这些作品再现了铁血年代的反抗和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踏东北大地，对民众实施血腥统治与残酷屠杀，但英勇的东北人民并未屈服，自发掀起反抗浪潮，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是成为打击日寇的中坚力量。多篇小说从不同视角，书写了普通民众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投身抗战的历程。王培静小说《回家的路有多长》中，山东青年来喜在家乡被毁后毅然加入抗联，为部队运送物资、护送人员，在战斗中出生入死，最终壮烈牺牲；安学斌的小说《酒火》中，市井掌柜面对日寇的蛮横掠夺，沉着果敢，以智斗勇，用满腔热血痛击敌人；廉世广的小说《西北河棚奸》，普通百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铲除奸奸、破坏敌人的侵华计划，守护抗联的生存与活动空间。

作家以当代视角，书写在日伪统治者面前的不同人物、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东北民众和抗联将士，不惧流血牺牲地和敌人进行殊死的反抗和斗争，这种多元的文学表现形式，加深了已远离战争硝烟的人们对于这场战争历史的深刻认识，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为保护今天的和平踔厉奋进的力量。

这些作品刻画了英勇的东北民众，塑造了英雄的群像。文学作品是历史的再现，作品将被遗忘的民间记忆与边缘群体重新唤醒，让人得以回望、敬仰与缅怀东北14年抗战中的无数英雄。黎光的长诗《东北抗联》如一幅英雄画卷，以激越的文字穿越时空，勾勒出抗联战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炸桥梁、袭敌营，无衣无食却坚守奋战，同生死、共患难，舍身掩护战友的激烈场景，让东北抗联的英雄群像跃然纸上。马宝山的小

《将军的胸怀》以文史交融的手法，塑造了江桥抗战中马占山将军誓死守卫国土、气吞山河的英雄形象，尽显民族英雄的铮铮铁骨。刘刘的小说《乡村皮影》以平淡质朴的笔触，讲述民间志士以皮影戏为掩护，秘密传递军事情报，用生命完成抗战任务的故事。谢华的《遥望故乡满城丁香》，则以非虚构的文学表现形式还原了革命作家诗人金剑啸以文艺为武器抗争侵略者，而对敌人宁死不屈的生命历程。

作家在创作中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抑或是虚构的文学形象，经过了“写人——写群——写魂”的三重叙事，把这些英雄的个体转化升华为民族精神，凝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强大动力。

这些作品突出了人和自然相互依存，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新的角度。东北抗战的岁月里，抗联战士与民众不仅在严寒、密林、冻土等严酷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更与当地野生动物形成了特殊的互助关系，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主题。廉世广的小说《鄂伦春人的鱼窝棚》中，鄂伦春人依托深山环境，熟知动物习性，将窝棚作为抗联的歇脚点与情报中转站，面对日寇讨伐，巧妙利用蜂蜜引导野兽，让蜜蜂、野猪、黑熊、毒蛇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勇敢战士”，重创新创敌人。陈立群的小说《黑马》和李冬的小说《父亲和三只黑熊的故事》等作品，也都塑造了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人与野生动物共同抗敌的美好愿望。

作家在创作中没有沉溺于历史回望，而是与时俱进融入现代生态观，展现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相依相助的生态智慧与人文精神，这一理念对于今天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些作品牢牢扎根东北独特的地域环境，以丰饶的黑土地、连绵的群山、冰封却暗流涌动的河川为宏大背景，谱写了一曲曲“逐日寇，复东北”的壮歌。诗人以满腔的深情写出了在这片地域诞生的英雄——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周保中、魏德顺……他们的忠骨在白山黑水间安息，浩气在天地之间长存。

如果说诗歌仅是以立体的语言礼赞了在这块地域上的英雄，而小说则是在东北这个特定的地域，以地理空间为根基、以当地风物民俗为血脉、以方言土语为声腔，更加细腻地对东北民众和抗联14年的抗战，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广阔叙事。陈力娇的中篇小说《大地苍茫》以东北山村为背景，讲述日本开拓团掠夺国土、欺压百姓，当地民众从隐忍到觉醒，最终投身抗联、奋勇抗争的故事。刘宏的小说《拐子乞丐》将抗战故事置于松花江边的良古镇，塑造了残疾乞丐化身情报人员，智斗汉奸的英雄形象。

作家在创作中注意突出东北的地域特点——深山、严寒、冰雪、密林等地域特质，融合殖民创伤与历史记忆，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淬炼出作品粗犷的史诗感，赋予人物凛冽而坚韧的精神品格。

另外，这些作品如锋利的手术刀，“划开那段被血泪浸泡的历史，将被碾碎的人性本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作品既刻画了日寇以杀人取乐、残暴凶狠的人性异化嘴脸，也书写了战争中的人性觉醒与救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书写战争是为了更好地珍爱和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新国君的散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吴传玖的诗歌《烽火记忆与祭奠》等作品呼唤今人铭记英雄事迹、不忘抗战历史，铭记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用热血捍卫民族尊严的峥嵘岁月。

除了东北本土题材，《北方文学》还收录了多篇地域之外的抗战作品，如徐剑的小说《药》、马明贵的小说《1938年的枪声》、凌翼的散文《国殇警钟》、田万里的散文《我血液中的一首歌》，都从不同的维度，讲述了中国抗战的故事。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抗战题材作品发出了铿锵有力的时代警示：“烽烟早已消散，但历史却不可忘记！”（见新国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它需要更多的作家、诗人以全新而深刻的视角，再做深入的挖掘，再做潜心的创作，建构起一座座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北抗战题材的文学丰碑。

大雪初霁，晨曦微露，一抹玫瑰色照在这些《北方文学》的封面上，似乎期盼着它在新的一年里结出新的硕果！

人类对于历史的书写始终执着。历史的书写让我们审视人类的起源，人从哪里来？进而探求当下的人类处境，人是谁？历史的书写也蕴含着面向未来的书写，它要猜测和破解人类的去向。文学对历史的叙述，价值也在于此。文学对历史叙述的有效弥补，细节还原、人性呈现、事件预测、脉络走向推演、价值判断、语言有效融入等都是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对于历史的书写，关于抗联的，我最喜欢阅读的是周保中将军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这部书100多万字，记载的细节是饱满的，有血有肉。比如，白山黑水间，抗联战士在抗击日军侵略同时，如何度过寒冬密林的日常生活，吃什么饭菜，煮什么野菜汤，如何防冻，如何筹粮，如何召开简易会议，如何传递情报，如何躲避日军的包围等等，这些独特的细节呈现，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是最闪光的部分，因为它逼近历史语境之真，也逼近文学的真谛之真。这种宏大的极端环境下的微观真实，让历史在细节中鲜活起来，呼吸起来。

在前段时间参加的“龙江抗联文学作品研讨推进会”上研讨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廉世广《从鸭绿江到大通河》，王跃斌的《箭头松》《最后八天》《赵尚志之死》等，文中所还原的历史细节是可靠的。王跃斌短篇小说《浓雾》对东北的还原，抗联战士徐海和刘凤在原始森林中克服严寒寻找出路的过程等，很出彩，若没有东北生活，没有林区的生活，是不会高度还原历史本身的。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对赫哲族习俗、捕鱼狩猎生活、民族演化史的生动书写，是经过长期相关资料搜集整理和阅读分析，并且曾多次奔赴赫哲族居住地实地踏查。廉世广《从鸭绿江到大通河》看似是个人传记，但可能更接近非虚构文学，作者本人也是多次到档案馆查阅日伪时期的资料，走访党史专家，寻找与李秋岳有关的文史资料，并踏查李秋岳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如此，三位作家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存在于历史褶皱中的细腻肌理，给了历史一个真实的注脚。

我注意到，对于抗联历史题材的书写，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陷入了狂飙式的套路化叙述中，作品中没有对历史的尊重，故事的主人公也非好即坏，非黑即白，情节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化框架中，英雄如同无所不能的神明，敌人如同蠢笨妖魔，原本复杂的历史进程被演绎成单薄的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如此，整部作品也沦为了简单粗暴的说教之作，除了阅读的一时之快，难以让人掩卷深思和共情。实际上，从古至今，人类的存在都处于黑白灰地带，因而，在抗联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复杂性的书写”可能是当下这类题材必须要予以突破的。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塑造了赫哲族和汉族刘海、张大地、朱子辰、林峰等英雄人物群像，也塑造了葛一凡（老A）、尤琳（石田千叶）这样有着复杂矛盾内心的人物。葛一

凡因孩子被日军控制而被迫成为间谍，最后因醒悟而自杀。尤琳（石田千叶）的身份更是撕裂的，这位赫哲姑娘从小被拐走，成为凶狠的日军特务高深，最终在残酷现实中找到了真相，完成了自我救赎，葬到本族的墓地中。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中，也提供了人性真实可感的情节。抗联战士刘凤、徐海、于江汇合后，重伤中的于江想扶着刘凤睡，弥补过去没碰过女人的遗憾，后来他战胜了自己的私念。最终徐海、于江因伤重不想拖累刘凤，为刘凤留下了装备后二人凿冰沉河。这是可信的人性自我净化过程，极端绝境中利他精神得到了彰显。也由此，文本的可信度也就完成得愈高。

从小说中事件的营造构建看，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精心安排了两条并进的线索，使文本保持了叙述的厚度。明线与暗线并行，暗线所富含的谍战质地增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感染力。日军的“A计划”——即生化武器作战，即将实施，我党代号“海东青”的林峰深入敌人内部潜伏多年，最终成功粉碎了日军的疯狂计划。叙述跌宕起伏，多线索的叙事结构也呈现出一幅立体而复杂的历史图景。廉世广的《从鸭绿江到大通河》则几乎以线性推进事件，在线性叙述中穿插插叙等手法，如同大树主干再生枝杈，使整体框架更加饱满。王跃斌在小说事件的组织中善于选取历史片段，以充沛的细节加以灌注，力图还原鲜活的历史现场。不仅《箭头松》如此，写杨靖宇的短篇小说《最后八天》和写赵尚志的《赵尚志之死》也同样如此。历史并非仅由宏大事件构成，而是由无数变幻多端、看似微不足道轻重的细节交织而成。如此，他的小说既具备历史真实性，又富有文学感染力。

语言是小说成败的关键，语言的有效介入为小说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可能性。王跃斌的《箭头松》用近乎散文化的语言写成，《最后八天》和《赵尚志之死》则大量运用东北方言行文，读来亲切自然，透出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广泛使用描写地域风物的诗化语言及赫哲族语言，别具韵味。廉世广的《从鸭绿江到大通河》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语言呈现出不温不火的叙述风格。

东北抗联历史是丰富的创作资源和精神资源，对它的书写远未得到充分挖掘。目前的相关题材作品，与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之间尚有距离。我以为，当代作家如果有志于从事此类题材创作，需要在写作中投入更大的艺术勇气，并掌握更丰富的叙事技巧。如何通过史实折射当代问题，使抗联文学成为我们思考现实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们思考现实的问题所在。抗联历史不仅是过去时，更是现在进行时。笔墨当随时代，作为民族的记忆，我们更应从沉痛的民族记忆中走向人类的共识——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应成为人类直面自身处境的一面镜子，成为地球上人类相互对话、反思并汲取智慧的源泉，而不是沉重的包袱。

演进与嬗变：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

□蒋叶

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由《文艺报》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评选发布，其中“新大众文艺”高居榜首。它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的人民大众参与创作的新型文艺生态，展现了大众文艺发展的新平台、新特点、新水平。其中以网络文学、微短剧等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样本被视为继承中国文学“人民性”传统的创造性实践。这些现象既有对传统文艺形态的推陈出新，也有新文艺形态的兴起；既迎合年轻一代的文化趣味和审美要求，又具有中国经典文学的内在追求。

“新大众文艺”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经历了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的演进与嬗变，其发展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启蒙与救亡”中的大众化转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文艺走向大众奠定了语言基础。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将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人”的“平常生活”与情感，“精英”文学初步具备了大众视角。“左联”开展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三次讨论，在理论上为文艺大众化做了前期准备。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此时期大众文艺的标志性事件，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创作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的作品，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高潮。此时的“大众文艺”，其“新”在于内容和服务对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大众，而形式则是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利用。

第二阶段发生在1950—1970年代末期，以体制化与标准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一元化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艺”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延续《讲话》精神，“人民文艺”开始建立，文艺创作被高度组织化，形成“三结合”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创作原则。同时，“样板戏”的创作达到巅峰，通过“三突出”原则和程式化的艺术手法，将政治诉求与艺术形式紧密结合，达到了某种极致的“大众化”。

第三阶段发生在1980—1990年代，在“新时期”的复苏与转型中，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大众文艺”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体现出高度的市场化与多元化特征。80年代，“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思潮迭起，文学在承载思想启蒙功能的同时，仍然是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对于娱乐性、消遣性阅读的需求不断高涨，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诗歌等大众文艺形式兴起，商业化的大众文艺开始成为主流。随着媒介变革的驱动，电视剧、流行音乐

等极具影响力的大众文艺形态通过电视、磁带的普及广泛传播，表达了不同向度的大众情感和需求。这个阶段“大众文艺”与市场、消费、流行等概念紧密相连，其发展动力也从政治主导逐渐变为市场主导。

二十一世纪初，大众文艺进入到新媒体时代，表现为“网络化”与“分众化”。互联网的普及重塑了“大众文艺”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模式。网络文学、短视频、直播等文艺形态层出不穷，降低了文艺作品创作和发布的门槛，实现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创作愿望，“大众”不只是“文艺”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成为了参与者和创作者。在这一阶段，大众文艺进入网络化、数字化、互动化、圈层化时代，其“新”体现在技术赋能带来的创作民主化、多元化，以及基于互联网逻辑的全新文艺生态系统的建立，“大众文艺”也真正步入“新大众文艺”阶段。

“新大众文艺”是技术变革、社会结构和文化心态转变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大众文化在数字时代的情感结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新大众文艺”在新的历史阶段产生了新的时代特征，成为分析当代中国文艺生态的重要切入点。一是媒介性与跨媒介融合。文艺作品不再局限于单一媒介，而是围绕一个核心IP，在小说、漫画、动画、游戏、短剧等多个平台上展开叙事。

二是数字化与网络化传播。依赖算法推荐、社交媒体传播、弹幕互动、粉丝社群发酵，传播速度极快，互动性极强。三是受众参与下的互动生产。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创作者。在网络连载文学中，作者的创作可能会受到读者评论和反馈的影响；在短视频平台上，观众可通过“共创”或“二创”对视频进行内容再创作。四是亚文化与传统主流价值的交融。“新大众文艺”常常是青年亚文化的前沿阵地，它既可能包含对主流价值的挑战和疏离，也日益被主流文化所收编和利用。五是审美经验日常化与碎片化。为适应移动端阅读和消费，文艺作品节奏加快，情节单元变小，更强调在短时间内抓住受众注意力。审美风格包括快速切换的节奏、密集的梗、吐槽、反讽、戏谑解构等，逐渐符合网络传播特性。

“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要素定义与塑造的文化实践领域，“十五五”规划将“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顶层设计，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有助于加强对这一新兴文艺的支持和引导，推动更多资源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新大众文艺”也将以全民创作的壮观图景、持续创新的艺术形态，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能。